

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

张灿强 龙文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

【摘要】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对延续中华文明火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当前,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中农耕文化遗产呈加速消亡态势,生存环境恶化导致传承危机,保护制度未成体系,传承途径缺乏创新。新时代,要切实转变观念和思路,让农耕文化遗产“活”起来,彰显其时代价值。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农耕文化遗产,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政策支持方式,做好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农耕文化遗产;乡村振兴;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4-0115-08

The Protection Dilemma and Inheritance Path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ZHANG Can-qiang LONG Wen-ju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Research Center Rural Economy, Beijing 100810)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s are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s are disappearing rapidly.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leads to the inheritance crisis. The protection system is not systematic, and the inheritance approach is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change our ideas, make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live” and show its value of the time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agricultural heritage, build a perfect system, increase and innovate policy support and methods, and focus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中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农耕历史可以追溯到至今一百万年前,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璨若星辰的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农耕文明火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农耕文化遗产的现实状况和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要从理念、制度、路径等多面进行改革和创新,让

[收稿日期] 2020-04-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贫困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产业扶贫协同路径研究”(17CSH012)

[作者简介] 张灿强(1983-),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耕文化、农业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龙文军(1971-),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文化、乡村治理、农业保险。

农耕文化遗产“活”下去,更要“活”起来,彰显其时代价值。

一、农耕文化遗产的现实载体与保护进展

(一)农耕文化遗产及其现实载体

“遗产”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郭丹传》,指个人或家族的祖先遗留的财产,后来用以指世代积累和传承的物质或精神财富。1955年4月,农业部曾主持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由此推动了中国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和农业史综合研究工作。中国农史事业奠基人之一万国鼎先生认为祖国农业遗产既包括古代农业文献、考古发掘材料,也包括农民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①。石声汉先生曾专门撰写《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他认为农业遗产概念比较宽泛,总体可以划分为具体实物和技术方法两大类^②。李根蟠倾向于把文化遗产划分为“固态”的和“活态”的,前者是历史上已经定格的,后者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③。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④。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提出引起国内外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的热潮。王思明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互融合的形态,并将农业文化遗产细分为10类,即物种、遗址、技术方法、工具与器械、工程、聚落、景观、特产、文献及制度与民俗^⑤。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文献类、技术类、物种类、民俗类、工具类、品牌类,而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更强调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景观,强调遗产的系统性^⑥。

农耕文化遗产作为官方用语首次出现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意义上讲,农耕文化遗产可能并非是一个学术用语,但它的现实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其保护和管理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事,还涉及文化(文物)、林草、水利、住建等诸多部门,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将涉及农耕文化的遗产统一纳入国家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中,上升为国家战略。文章暂且急于对农耕文化遗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农耕文化遗产的现实载体上,这对明确内容和任务,推动保护与管理实践可能更有意义。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农耕文化遗产的现实表达可以包括物质性载体、非物质性载体和系统性载体(表1)。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有时候不能严格区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古农书,从实物看它是一本书,但更大的价值是它所记载的农业知识、技术、制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之,非物质遗产有时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形态或者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农业祭祀,需要配套的服饰、用品等来表现;农耕信仰、崇拜等也存在一定的对象表达,例如神林崇拜、家畜崇拜等。

① 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②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③ 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④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资源科学》2006年第4期。

⑤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资源科学》2009年第6期。

表 1 农耕文化遗产的现实载体		
分类	内容	举例
物质性载体	农业遗址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1.2万年前野生稻硅石标本和1万年前栽培稻硅石标本)
	农业物种	云南哈尼梯田的传统红米,太湖流域的太湖猪
	农业工程	四川的都江堰,安徽寿县的芍陂,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江西抚州的千金陂
	农具	犁、耙、耢、耖、水车等
	村落(包含传统建筑)	河北邢台王硎村(600余年历史,现存有古石楼建筑群),北京门头沟爨底下村(明代建村)
	古农书和文献	《吕氏春秋》《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
非物质性载体	农业生产技术	代田法、区田法等抗旱栽培技术,绿肥轮作技术,间作套种技术
	农业知识、制度	二十四节气,“头伏萝卜二伏菜,中伏荞麦熟得快”等农谚,常平仓制度,古代休耕制度
	传统工艺	四川的郫县豆瓣传统制作工艺、青神竹编,福建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山东曹县柳编,河北大名草编
	农业民俗(信仰、仪式、节庆、习俗)	对山林、土地、家畜的信仰和崇拜(比如哈尼族每年春耕前举行的祭寨神林活动),都江堰放水节,浙江省遂昌县班春劝农,吉林省的查干湖冬捕习俗和长白山采参习俗
	有关农耕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	云南红河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乐作舞,浙江青田的鱼灯舞,四川的川北薅草锣鼓、江安竹簧,湖南辰溪县的茶山号子、娄底的新化山歌
系统性载体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和景观)	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系统、广东佛山基塘农业系统、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

传统农业生产系统既包含物质性遗产,如传统品种、农具,也有大量的非物质遗产,如传统知识和技术,农俗等。生产系统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的“生境”,一旦受到破坏或者荒废,系统内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就丢失了存在和传承的土壤,进行系统性的保护更有现实意义。

(二)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现状

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散布于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保护工作中。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级和市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密集修订和颁布,特别是修订了《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颁布了《博物馆条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2006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设为“文化遗产日”,从2017年起,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纳入国家保护体系的农耕文化遗产从类型和数量上逐步增多。从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截至2019年10月,分八批共公布5053处,其中部分涉及农耕文化遗产(主要为古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黍和粟碳化谷物标本,经鉴定距今约8000年,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000多年,被认为是世界小米的起源地。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截至2014年分四批公布1372个国家级项目,其中也有部分是农耕文化遗产,主要涉及农产品加工技艺,反映农耕劳动、祈福的传统音乐、舞蹈以及农耕民俗。如流传于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区的《四季生产调》是山区梯田生产技术及其礼仪禁忌的百科大典,按季节顺序讲述梯田耕作的程序、技术要领以

及与之相应的天文历法知识、自然物候变化规律、节庆祭典知识和人生礼节规范等。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开始共同组织评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截至2018年12月分七批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2012年开始,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开展“中国传统村落”评审认定工作,截至2019年6月,共计6879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原农业部组织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工作,截至2020年1月,分五批发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项。

此外,有些农耕类的景观、知识、传统农业系统已纳入世界的遗产保护体系,例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开平碉楼与村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南京云锦、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等15个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四川乐山东风堰等19项古代灌溉工程被评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文化遗产挖掘和调查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1956年起,国家开展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基本廓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家底。2012年,国家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可移动文物普查,共计普查1亿多件(套),其中农林牧渔业收藏的可移动文物数量占全国登录文物信息完整的国有可移动文物(6400多万件)的0.06%^①。同年,原农业部组织开展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论证,共发掘有潜在保护价值的农业生产系统408项。2015年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截至2018年底取得阶段性成效,新收集资源4.2万份,长期保留种质资源数量突破50万份。

二、农耕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耕文化遗产被遗弃甚至被破坏的现象严重,其传承的环境也不断恶化,在保护制度、传承措施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一)社会经济转型中农耕文化遗产呈现加速消亡

农业在采用工业化、信息化的先进技术并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将工业模式简单套用到农业上,甚至认为“大机械、大马力”可以解决中国农业的所有问题。传统农业中用地养地、循环利用、间作套种、精耕细作的技术与模式被“大水、大肥、大药”的“石油农业”取代,传统农事操作规范几近失传。种养结合链条断裂,把耕地、山林等资源当成无限使用的“机器”,由此带来农业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的用地挤占,追求高产的单一化和商品化种植与养殖,使农业种质资源种类与数量显著减少,特别是交通便利地区作物野生近缘植物消失速度加快。比如,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入海口附近原有近百公顷野生大豆,由于石油开发导致基本灭绝^②。濒危和濒临灭绝品种约占地方畜禽品种总数的18%,超过一半的地方品种数量呈下降趋势^③。水域环境污染加剧了近海和流域野生水生生物资源数量下降的趋势。

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工业和城镇转移,自然村落加速消亡。全国自然村的数量由2000年的363万个减少到2010年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多万个自然村^④。不少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在“增减挂钩”以取得建设用地指标的利益驱使下,大搞“拆村并居”、“农民上楼”,出现村不像村、城不像城的“村中城”。农民

①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8日第003版。

②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农业科技导报》1999年第2期。

③ 农业部:《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2017年。

④ 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

在改善居住条件时,不断拆旧建新、以洋带土,祠堂、庙宇、牌坊、老宅、戏台被大量拆除或被现代建筑形式取代。“耒犁水车镰刀锄、石磨碾盘杈耙锹”等传统农具,农村老物件被当成“破烂”大量丢弃。传统技艺、民间艺术等大量消失,20世纪后50年,中国传统戏曲剧种减少四成多,其中减少最多的是农村小剧种^①。

(二)生存环境变化中农耕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

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使农耕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社会逐渐“原子化”,农民更加关注血缘利益圈,而对地缘共同体不再那么上心^②。随着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农民“兼业”成为普遍,有的甚至举家搬迁,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松散,人们在共同劳动和生活基础上开展农俗活动的传统逐渐淡化,原有的“草台班子”随着关系的疏远和人口流失而逐渐解散。

现代都市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农村文化不断边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为主。调查显示,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最多的文娱活动是看电视和打牌,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约为2.76小时,农民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逐步降低^③。另一方面,有的地方为迎合旅游消费,将民俗文化过度改写或扭曲,出现“伪民俗”现象。

走出农村的农民接触到不同的人群、文化和思想,传统观念受到冲击而弱化,城市生活、现代时尚成为年轻人追求的目标,对那些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传统手艺不愿学习,传统工艺面临“人去艺亡”的风险。2017年发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平均年龄为63.29岁,其中80岁以上的占近10%,而40岁以下的仅占0.65%^④。

(三)现有管理体系中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充分

农耕文化遗产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保护矩阵。从顶层设计上,对农耕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外延没有权威性的界定,缺少全国性的普查和规划。农耕文化遗产涵盖内容广泛,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完全覆盖,大量遗产很难被认定为文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立法层级较低,没有具体规定农民的主体地位、相关权利。农民基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保护以及传承文化产生的权利保护存在立法空位,对基于农耕文化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传承权等新型权利未有确立^⑤。

在现实管理中,不同类型的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分散在多个部门,既存在“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又有在保护内容、项目设计上沟通协调成本较高的问题。现行的政绩考核,农村文化被当成“软”指标,做好了锦上添花,做不好也到不了“丢帽子”的程度,得不到足够重视。乡镇干部心目中政府首先应该干的是农业科技培训,而传统的民俗旅游、庙会、花灯会以及民间工艺展览等被他们排在备选项中,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才是基层政府最为关心的。

全国文化事业费虽稳步增长,但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低,仅为0.42%,甚至低于上世纪90年代水平(1990年~1998年这一比重保持在0.47%~0.52%之间)。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投入严重不足,纳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虽可拿到300万国家财政资金,但对修缮量大、修缮成本高的村落来讲,还是杯水车薪。笔者在河北王硖村调研了解到,很多古民居年久失修,然而古民居的材料费高,技术工人难找,人工成本高,修缮房顶的费用在500元/m²,门楼的修缮成本为5000元/个,修缮成本远远高于普通住宅。

① 佟玉权:《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② 胡泽学、李琦珂:《关于中华农耕文化现实价值的思考》,《古今农业》2015年第2期。

③ 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④ 王莹:《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公布 平均年龄63.29岁》,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7/c_129874567.htm。

⑤ 刘慧萍:《农耕文化传承与农民权利保障的互动及协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重要农耕文化遗产保护还未列入国家专项财政,目前118个遗产地覆盖40多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且与少数民族聚居区重叠性较大,本来就极其困难的地方财政很难顾及农耕文化遗产保护,而这些地方恰恰又是农耕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地方,开展保护的迫切程度较大。以哈尼梯田为例,近年来国内外游客逐渐增多,春节旺季已经出现一房难求、交通拥挤的状况。但是旅游配套设施不健全,短时间大量游客进入,旅游垃圾不能有效收集处理,客栈用水量激增,造成梯田旱化等生态问题^①。

(四)传统传承路径上农耕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办法不多

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形式单一,以放电影、送书报等为主要形式。而群众基础好的民俗文化活动开展较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和形式并不多。基层文化阵地功能薄弱,许多乡镇文化站成为无人员、无经费、无场地、无活动的“四无”站所。青少年是传承农耕文化遗产的希望,而现在的农村基础教育很少涉及农耕文化的教育内容,缺少乡土教育环节。

博物馆是保存和展示文化遗产,促进、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博物馆总量在2018年底达到5354家,约每26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但离发达国家每10~2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②。当前我国博物馆基本与农村、农民绝缘,除个别遗址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外,博物馆基本位于城市。拥有自己的村史馆、陈列馆的乡村少之又少,村民缺少对本村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乡村似乎处于“集体失忆”状态。中国古代农业文献和资料浩如烟海有许多制度和政策对现代都有启示意义。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应对经济危机时实行的“无追索权贷款”农业政策,就是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中得到启发^③,而我们挖掘和转化还远远不足。

农民还没有从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中充分分享成果,在以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为资源的旅游开发中,村民还面临工商资本的强势竞争,在旅游产业链条中分享较少的收益。无论在硬件设施、经营理念,还是在营销管理上,本地居民都竞争不过工商资本。很多村民将房子“一租走之”,成为拿着房租的城镇居民,村寨成为没有本地居民、没有传统文化的“躯体”。

三、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耕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将会越来越凸显。针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在保护好遗产本体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深入挖掘精神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农耕文化遗产“活”起来。

(一)要用历史的眼光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农耕文化遗产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之基。农耕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思想,支撑着中华农耕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保护传承农耕文化遗产,最终目的是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要站在弘扬中华文明、延续文化香火、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深刻认识保护农耕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政府不仅要肩负起保护农耕文化遗产的责任,坚持保护农耕文化遗产的人民导向,充分依靠广大农民群众,保护的成果要更多的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还要引导广大群众遵循“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通过持续的宣传、广泛的动员,营造保护农耕文化遗产的良好社会氛围。

① 张灿强、沈贵银:《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及其产业融合发展途径探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 曹兵武:《博物馆热·博物馆学·博物馆文化——博物馆发展的关键是博物馆人》,《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

③ 陈锡文:《充分发挥乡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北京日报》2019-02-25第01版。

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遗产不是让农业发展回到过去,让农民生活依然落后,而是挖掘农耕文化遗产蕴含的宝贵智慧和经验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所用。现代方式、科技手段对农耕文化遗产进行适当改造,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转化和创新,使农耕文化遗产更好融入当今农民生活,让保护和传承的成果成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新动能。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扬弃地开展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二)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第一,开展全国范围的农耕文化遗产普查,建立“名录”制度。以县为单位,对农耕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生存环境、保护现状、传承情况等进行登记。制定全国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按照“四类”村划分^①,尽快摸清特色保护类村庄分布和现状,划定全国农耕文化重点片区、农耕文化保护红线,强化连片保护和底线思维。

第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出台《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法》、《传统工艺保护条例》,提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的立法层级,逐渐整合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法》,将涉及农耕文化传承权规定为新型的民事权利,探索农业景观权,保障农民的文化权利。

第三,强化政府保护责任。在县级层面成立农耕文化遗产领导小组,明确管理部门,制定保护和管理制度,切实将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绩考核。建齐配强乡镇综合文化服务站(中心),在建设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村(社区)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时,要统筹村办公场所、养老、卫生等设施建设,防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切实提高使用效率。

第四,构建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引导成立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学会、协会、联盟等,充分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入到保护事业中。深入开展农耕文化遗产进社区、进校园,鼓励文化服务志愿者队伍更多的深入农业农村,将本土农耕文化内容纳入基础教育课程,让农耕文化园成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在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传统工艺相关专业和课程,提高城市居民和青少年对农耕文化遗产的认知。加强乡土文化人才发现和培养,吸引更多年轻人充实到文化建设队伍中。

(三)要以发展的思维加大和创新政策支持力度与方式

第一,切实加大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投入。持续扩大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遗产类型和数量,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文化遗产基金制度,如英国艺术基金是一个涵盖文物保护及博物馆相关业务的英国最大的文化艺术、文化遗产类基金会,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会费收入、捐赠费用和投资收入。支持县乡两级建立农耕博物馆,将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特色农具、生活老物件、传统手工艺品等进行系统整理、集中收藏、分类展示,配以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支持有条件的村建设村史馆或者在村文化室、文化礼堂,增设展示区域,挖掘和梳理本村的历史、习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对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建设特色农耕博物馆或展示馆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结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综合运用互联网、三维、AR/VR等科技手段,推进农耕文化遗产数字化存档和展示。建立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传统村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并加强手机、网络等推送。加强科学研究支持力度,注重科研成果转化,让更多的成果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农业农村政策制定。

第二,创新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激励机制。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开展“文化下乡”的同时,引导农民群众自建文化队伍,挖掘优秀乡土文化形式,对活动经费给予一定支持。对农村传统手工艺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根据其传承情况、带动农民情况进行适当奖励。对合理利用农耕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开发并带动农民增收的单位给予税收优惠。建立农耕文化遗产利用利益分享机制,探索农耕文化遗产所

^① 指《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聚集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拆迁撤并类村庄四类村庄。

有权入股,进行商业开发时要尊重农民意愿,项目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当地农民。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家、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以及各类文化机构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转化,创作出更多农民群众喜爱的农耕文化作品。

第三,继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推介和申报中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让更多的项目列入保护名录。支持粮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保护行列。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推动制订《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争取成为国际公约的发起国。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加强农耕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为世界提供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四)要以活态的路径做好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第一,深入挖掘农耕文化遗产资源,使其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新动能。优化地理标志认证,挖掘传统品种资源的文化内涵,加大品牌培育,让这些农产品不仅吃得放心,吃得有营养,更吃出“文化”味。基于农耕文化遗产发展创意农业,建设集农事体验、文化展示、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农耕文化园,破解乡村旅游同质化问题,提高文化品位。依托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和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培训园区(基地),遴选具有较大产业开发价值的农村传统手工艺进行重点打造,鼓励技术和设计能力较强的企业、高校等单位到农村设立传统手工艺工作站,结合现代生活需要,改进设计、材料,提高农村传统工艺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传统手工艺在带动农民增收、促进精准扶贫中的作用。

第二,发扬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运用现代工程、科技手段,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传统村落保护中,在景观设计、建筑形式上注重本土文化元素的植入,从设计风格、空间布局、色彩搭配上尊重乡村机理,形成林、田、路、宅、水的和谐统一。

第三,发挥农耕文化遗产培育文明乡风和促进有效治理的作用。挖掘本地区传统的节庆节日、民俗活动,选择性地恢复,并融入农民丰收节,使农民丰收节办得更乡土味,让更多的农民乐于参与其中。将农耕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应时守则、父慈子孝、敬老孝亲、兄友弟恭、勤俭持家、淳朴敦厚、吃苦耐劳等精神品格重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现代版“村规民约”,经过村民议事会、村民大会充分讨论后加以固化,利用农村大喇叭、标语、手机推送等方式扩大宣传,将其内化为价值准则,外化为行为规范。持续开展好家风、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以文化人的重要功效。

[参 考 文 献]

- [1] 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2] 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 [3] 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J].中国农史,2011,(3).
- [4]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J].资源科学,2006,(4).
- [5]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把握的八组关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 [6]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J].资源科学,2009,(6).
- [7] 佟玉权.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
- [8] 胡泽学,李琦珂.关于中华农耕文化现实价值的思考[J].古今农业,2015,(2).
- [9] 刘慧萍.农耕文化传承与农民权利保障的互动及协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J].理论与改革,2018,(3).
- [10] 张灿强,沈贵银.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及其产业融合发展途径探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